

在胶东半岛的晨雾里，在栖霞山脉红色的褶皱间，她诞生于1931年的霜降——那一年，“九一八”的炮声震碎了东北的天空，一个农家女孩的啼哭，在民族危亡的前夜，发出微光。她叫李少英。

14岁那年，她走进北海医院当了护理员。1945年8月15日，正在给伤员换药的李少英，忽然听到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——日本投降了！病房里的伤员举起拐杖欢呼，她和战友们抱成一团，又唱又跳，热泪纵横。那一刻，她坚定了跟党走决心；那一刻，她把自己交给了信仰。

16岁那年，孟良崮的炮火把天空撕成碎片。李少英看到一名伤员断腿流血，生命垂危。不到一米六的她，咬紧牙关，把人背上了肩。荆棘丛生，山枣枝刺破了她的脸，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她一声不吭，一步步朝山下挪。送到救护站时，伤员的双脚背已经磨破了皮，她的双手也在颤抖——但伤员的一条命，保住了！战后，她荣立二等功。16岁的二等功，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勋章。

然而，真正的信仰，总要在烈火与鲜血的反复淬炼中，才能铸成精钢。1947年7月，硝烟未散，在紧接着的一场恶战中，一颗冰冷的子弹贯穿了她的右腹部。钻心的剧痛几乎将她击倒，但她咬着纱布自己缠紧伤口，直至昏倒在转运伤员의担架旁。那道贯穿身体的伤疤，成了她向党组织递交的最虔诚的入党申请书。同年11月，在担架和绷带组成的前线救护所里，她举起满是血泡的手，面对鲜红的党旗，庄严宣誓。从那一刻起，她不仅是一名勇敢的医护兵，更是一名以生命守护信仰的共产党员。

淮海平原的冻土，刻下她奔跑的足迹；渡江战役的千帆侧畔，她的小船装满止血带与吗啡；解放上海的那些日夜，她连续几昼夜不眠不休，双手在血水中泡得溃烂脱皮，却托举起一个崭新的黎明！

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，李少英把襁褓中的女儿送回栖霞老家，转身跨过鸭绿江。那一刻，她是母亲，更是战士；那一刻，她把母爱压进心底，把家国扛上肩头。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阵地，她怀抱伤员，用自己的体温对抗冰雪；面对伤势严重疼痛难忍的战士，她哼着胶东小调为他们缓解情绪；她把最后半卷绷带缠在战士的伤口上，自己的血却在雪地上开出红梅。

她曾口对口为一名10岁的朝鲜女孩吸痰，一大口脓血痰呛进她嘴里，女孩“哇”地哭出声，得救了。她曾持续抢救一名触电的战士近一个小时，所有人都说“不行了”，她却坚持“再做半个小时”！战士微微呼出一口气，活过来了。她说：“医生一定要为病人坚持到最后几秒钟。”这句话，是她对生命的最高敬畏。

在这条烽火连天的征途上，李少英并非孤身一人。她的丈夫陈福胜，出生在湖北大悟县那片红色热土上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。主力红军北上后，他毅然留在南方，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后随新四军东进抗日。抗战时期，他先是担任徐海东大将的警卫员，后又担任罗炳辉将军的警卫班长，在枪林弹雨中护卫着指挥员的安危。那些年，他用自己的胸膛为将军挡过弹片，用自己的忠诚丈量着革命的苦难与荣光。战功卓著的他，与李少英在烽火中结为伴侣，一个在前线运筹帷幄、冲锋陷阵，一个在后方救死扶伤、守护血亲。这对英雄伉俪，一个铸剑为犁，一个化血为乳，在战争后期，与战友共同撑起红军的脊梁！1956年5月8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党代会隆重召开，李少英和丈夫陈福胜双双光荣当选为代表——从一名普通护理员到党代会代表，这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荣誉。她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勋章，那是朝鲜方面授予英雄的崇高礼遇。

她是军长的妻子，却更像整支队伍的母亲。二十六军战旗上的每道弹孔里，都映着她穿梭的背影。官兵们说——只要看见李副处长的红十字箱，就像看见了故乡的屋檐，看见了母亲灶膛里的火光。

英雄的词典里，从没有“功成身退”四个字。1965年6月，在执行一次紧急战备物资转送任务时，意外骤然发生。巨大的冲击波将李少英掀翻在地，她再度身受重伤。这一次，她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。但身体的伤残未曾折损她半分锐气，休养过后，她像一颗被重新擦亮的子弹，再次推入事业的枪膛。1979年，一位军首长突发重症心脏病，生死系于一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少英凭借几十年战火锤炼出的科学方法果断处置，硬生生将病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那一年，她荣立三等功。这枚军功章上，镌刻的不再是枪林弹雨中的血泪，而是和平岁月里，一个医者对生命极限的挑战。

脱下军装后，她把手术刀换成羊毫，把处方笺裁成宣纸。她把一生最浓烈的色彩，倾注在牡丹的雍容与梅花的傲骨之间。她把两幅倾尽心血绘就的巨幅长卷，敬献给钓鱼台的巍峨厅堂——牡丹如火，梅魂如铁，恰似她从战火中提炼的丹砂。中央首长凝视画作，轻声赞叹：“您笔下的红，是信仰的颜色。”那一刻，老人眼中闪过14岁参军的晨曦、朝鲜战场的雪光，还有栖霞山上满坡的映山红。

2025年9月3日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。94岁的李少英作为受邀嘉宾，端坐在庄严的观礼台上。看着英雄纪念碑前整齐行进的三军仪仗队，她挺直腰板，胸前勋章碰撞的脆响，仿佛在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她用右手敬礼的弧度，丈量出一个民族从屈辱到尊严的距离。那一刻，她代表的不仅是自己，更是无数在烽火中献出生命的巾帼英烈！那是她此生最荣耀的瞬间，更是祖国对一位女儿、一位战士、一位母亲最庄重的回应。

今天她依然早起，在烟台军休所的窗前研墨。墨池里沉着淮海的月，笔锋上蘸着鸭绿江的浪。画案左边，整整齐齐摆着给山区孩子的回信——那上面有她关爱孩子的温度；右边，未完的画稿上，新长征的火箭正刺破苍穹。她说：“我画的是中国，从战火中提炼的丹砂，永不褪色。”

她养育了四个儿女，个个在党旗下举过拳头，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过贡献。如今他们都已鬓发如霜，却依然记得母亲的家训——“你们是军营里出生的孩子，血管里流的是胶东的岩浆。可以退休，不可以褪色；可以老去，不可以垮塌！”

这位95岁的英雄啊，她的皱纹里刻着孟良崮的弹道，她的白发间飘着抗美援朝的雪花，她的心跳至今保持着1945年欢呼胜利时的频率！当年轻人问起什么是英雄时，李少英提起笔，在宣纸上写下：“共产党员要有为人民而生、为人民而死的气概！”

于是我们看见，这盏明灯，把黑夜照成通途，让后来者看清信仰的方向。这面旗帜，被风雨抖落在身后，指引着一个民族永远的冲锋方向！栖霞的女儿啊，你用百年人生证明——信仰不是风干的标本，而是永远燃烧的火种；英雄不是遥远的传说，她就在我们中间，拄着拐杖，依然昂首挺胸，挺直脊梁！



杨朔的蓬莱根脉

□张爱敏 蔡玉臻

蓬莱北临渤海、仙阁巍峨，自古文风蔚然、崇文重教。杨朔的父亲杨镜海学识渊博、思想开明，是蓬莱新式教育的先行者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他积极倡导男女平等，力推女子启蒙教育，被推举为蓬莱第二小学(女子学堂)首任校长。杨朔的母亲柳淑漪出身儒门，为清末贡生柳淑之之女。她虽未入塾读书，却天资聪慧、通晓文史，能读《汉书》，熟谙稗官野史，谈吐清雅、见识不俗。家风浸润之下，杨朔自幼颖悟、灵气逼人。

杨朔，原名杨毓瑨，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，以《荔枝蜜》《茶花赋》《海市》等经典名篇享誉文坛。他的青少年时代，植根于蓬莱古城浓郁的书香文脉，历练于北国冰城的寒窗岁月。故土人文滋养、名校求学立志、异乡苦读精进、时代风云淬炼，层层铺展，为他日后兼具诗情画意与家国情怀的独特文风，奠定了坚实厚重的人生根基。



家世书香，童年启智

关于杨朔生年，通行文学资料多作1913年，而《蓬莱杨氏族谱》明确记载：“生于宣统庚戌年(1910年)三月二十二日。”其父杨镜海卒于1915年，依族谱推算，杨朔5岁丧父。若按1913年之说，其父去世时他年仅两岁，此后不可能陆续有四位弟弟妹妹出生，这与家族史实明显抵牾。本着地方史料研究的严谨原则，本文采信族谱记载，以1910年为杨朔出生年份。

蓬莱北临渤海、仙阁巍峨，自古文风蔚然、崇文重教。杨氏为当地书香世家，世代耕读传家、重视子弟教育。杨朔的父亲杨镜海学识渊博、思想开明，是蓬莱新式教育的先行者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他积极倡导男女平等，力推女子启蒙教育，被推举为蓬莱第二小学(女子学堂)首任校长。1915年，杨镜海遭庸医误诊不幸早逝，年仅38岁。

杨朔的母亲柳淑漪出身儒门，为清末贡生柳淑之之女。她虽未入塾读书，却天资聪慧、通晓文史，能读《汉书》，熟谙稗官野史，谈吐清雅、见识不俗。家风浸润之下，杨朔自幼颖悟、灵气逼人。他4岁随父诵诗、听母讲古，早早亲近古典文学；7岁遵母命入塾求学，拜伯父杨月村为师。

伯父杨月村为清末生员，毕生从教、精于诗学，著有《杜梨轩诗抄》。他爱才惜才、因材施教，除常规课业外，专门为杨朔增授《左传》等经典，督促其昼读夜诵、日积月累。杨朔少时偏爱诗赋，兴趣远胜经书，在伯父的悉心点拨与父辈的诗文熏陶下，古典文学素养迅速精进。

堂叔杨叔桥为清末廪生，曾任县劝学所所长，热心乡邑教育，曾将个人薪金尽数捐作办学经费，获政府嘉奖。他雅好吟咏，读书诵诗声调清朗。杨朔故居与其宅第相邻，朝夕闻诵，耳濡目染，少年心性在诗书声韵中悄然滋养。多年后，杨朔在《海市》小序中回忆，儿时隔窗听人诵读《秋声赋》，便恍然走入诗境。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书声文脉，孕育了他最初的文学想象。



丹青濡染，诗画筑基

杨朔散文的最大特色，在于情景交融、意境如画，文字自带清雅诗意，这种独特的文风，源自少年时代的艺



1950年冬杨朔在湖南衡阳。(照片由杨朔弟弟杨毓伟的女儿杨渡提供)

术熏陶，其关键影响来自外祖父柳淑之。

柳淑之为晚清登州知名画师，工于丹青、笔墨雅致，画作流传胶东，声名远及海外。少年杨朔常在外祖父家中观其作画、阅览珍藏书画，长期浸润笔墨意境，培养出极高的审美能力。“朔”这一名字，亦为柳淑之所取，1936年后正式沿用为文名。

书画修养深刻塑造了杨朔的写作笔法。他写景从不堆砌辞藻，擅长以画喻景、以文造境，将山川风物转化为立体画卷。在《泰山极顶》中，他写登顶所见山河盛景：“我觉得挂在眼前的不是五岳独尊的泰山，却像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，从下面倒展开来。”这种以丹青视角观照山河、以笔墨意境铺陈文字的写法，贯穿其一生创作，源头正在蓬莱少年时期的画艺濡染。

童年的诗意体验与审美积累，让杨朔的散文始终清丽含蓄、意境悠长，区别于同时代直白叙事的文风，形成独树一帜的诗化散文品格。



名校求学，立志从文

国民学校毕业后，母亲为杨朔择选蓬莱名校志成高等小学。校长姜致中曾留学日本，亲历辛亥革命登州起义，看透乱世乱象后决意归隐乡里、潜心办学。他终身不仕、淡泊自律、品德高尚、为人质朴，对少年杨朔影响极深。

志成高等小学为新式学堂，学制规范，课程先进，早年即开设英语课程，教学质量居本地前列。姜致中慧眼识才，称杨朔“秀外慧中，天资非凡”。他自编精简国文教材，推行精讲、勤练、细考的教学模式，坚持每周作文、逐篇精批细改，耐心启发、悉心培育，充分激活了杨朔的写作天赋。

学校学风开明，鼓励学生自由创作、办报传文、相互赏析，校园习作风气兴盛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少年杨朔正式立下文学志向，决心“做个小说家”。他广泛阅读新文学期刊，常年订阅《东方杂志》《小说月报》《红玫瑰》等刊物，博览群书、精进文笔。

15岁时，杨朔以“杨蕴山”为笔名，创作短篇小说《白士弘》，发表于烟台《威克莱》杂志。小说刻画趋炎附势、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，批判投机剥削的社会乱象，主题鲜明、褒贬分明，是他文学道路上有据可查的第一篇作品，在师生中广为流传，备受师长肯定。

少年杨朔不仅擅长文墨，更具正义感与行动力。当时校园文具多由商贩垄断抬价，他倡议师生集资经营校园小卖部，直接批发进货、平价供给同学，抵制层层盘剥，体现出早年朴素的社会良知与担当意识。

学业之余，他刻苦修习英语，日夜打磨发音，反复纠读、勤学不辍，先后求教本地学者与外籍师长，口语进步迅速。至高等小学毕业，他已能尝试翻译《聊斋志异》片段。因地域口音影响形成的独特“胶东尾音”，伴随其终身，成为一段求学趣谈。

少年时光，他交游广泛、师友众多，与同窗谈古论今、赋诗论文，课余亲近自然、赏花放风筝，体悟四时风物。这些鲜活、纯粹的童年体验，日后皆沉淀为珍贵的写作素材。名篇《荔枝蜜》中被蜂蜇的生活细节，便源自他少年攀树赏花的真实经历。



冰城立业，苦读精进

1925年，杨朔高等小学毕业，经舅父柳佑丞介绍远赴哈尔滨，进入英商太古洋行任职练习生，自此开启长达11年的冰城岁月。

凭借扎实的中英文基础，尤其是流利的口语能力，杨朔深得外籍雇主的信任和器重，入职半年即升任办事员，薪资稳定、立足安稳。工作之余，他勤学不辍，坚持就读英文夜校与法政大学夜校，持续深造学识、开阔眼界。

旅居哈尔滨期间，他拜名士李仲都为师，专攻古典诗文。李仲都为清末贡生，时任中东铁路局秘书、法政大学教授，学识渊深、诗法纯正，在哈市学界声望颇高。李仲惜才爱才，欣赏杨朔勤勉聪慧，固定每周夜间授课，初期薄取束脩，后分文不取、倾力栽培。

李仲都主张“学诗当学李杜”，以杜甫诗作为根基，系统讲授唐宋诗家名作，强调诗文贵在立意、创作重在风骨，教导其先立格局、再练辞采。严谨纯正的诗学训练，让杨朔文风日趋沉实、境界大开。

受师门教诲影响，杨朔早年习作便立意高远、心系家国。其《北征》—诗苍凉沉郁、寄慨深沉，抒发乱世漂泊、忧怀故土的情怀，李仲都读后大加赞赏，评其作“大有三堂风味”。此后，他以“杨堂叔”为笔名，多篇诗文刊发于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，年少崭露文名，被视作青

←1956年冬出席亚洲作家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印度新德里拜谒甘地墓。后排左四位为杨朔。(照片由杨朔弟弟杨毓伟的女儿杨渡提供)

↓杨朔。



年才俊。

李仲都待杨朔亲如子侄，日常关怀备至，闲暇常携其出游松花江畔，临水论学、开阔胸襟。为求得安静治学环境，杨朔高价租赁市区雅致寓所，闭门耕读、潜心创作，积稿成《北征诗草》，同时兼写戏曲评论、翻译域外文学，将寒珍珠长篇小说《大地》译介至国内连载刊发，创作视野愈发开阔。

青年意气之时，他曾与同道友人结伴游赏、把酒赋诗，留下若干抒怀诗作。消息传回家乡，伯父杨月村致书劝勉，告诫其戒浮华、重操守，宁可为诗沉醉，不可因酒放浪。杨朔谨遵教诲，收敛少年疏狂，戒除聚饮习气，一心向学、沉心治学，文风心性愈发稳重成熟。



封建婚困，心灵隐痛

正当杨朔在哈尔滨稳步立业、精进学业之际，一场传统包办婚姻，成为他青年时代难以消解的心灵隐痛。

1930年，依胶东乡土旧俗，家中为在外立业的杨朔张罗婚事。母亲柳淑漪未征求杨朔本人意愿，为其婚配蓬莱本地女子衣常春。二人年岁相当，学识、眼界、志趣却全然迥异：衣氏自幼缠足、未曾读书，深受旧礼教束缚，与接受新式教育、向往自由新知的杨朔毫无精神共鸣。

杨朔深知二人不合，多次恳请母亲解除婚约，奈何母亲观念守旧、固执不从。事母至孝的杨朔，念及母亲早年守寡、辛苦持家，不忍强硬逆逆，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顺从母命，接受了这场封建包办婚姻。

婚礼礼仪齐备、满堂喜庆，杨朔内心却疏离压抑、万般无奈。新婚夫妻隔阂深重、形同陌路、情意全无，婚后未曾留下一张合影。成婚数日，他便匆匆返哈继续工作。1936年，杨朔短暂回乡探亲，二人依旧貌合神离、相对无言，这段婚姻自始至终徒有虚名。

这场被动婚姻，酿成两人终身遗憾。衣常春终生困于无爱的旧式婚姻，郁郁寡欢、无从解脱、积郁成疾，1944年病逝，一生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。

对此，杨朔心怀深重愧疚，此后终身未娶、独自度日。1959年，他回乡探亲，堂叔杨子见其孤身多年，劝其再觅伴侣安度晚年。杨朔坦言，当年自己违心顺从母命，间接造成他人一生不幸，罪责在己、难以释怀，甘愿以终身孤寂自省赎罪，以求得内心安宁。这份隐忍深沉的愧疚与担当，深刻影响了他人生态度与文字底色。



冰城觉醒，投身革命文艺

11年冰城岁月，不仅磨砺了杨朔的学识文笔，更在时代洪流中完成了他的思想蜕变，使其从一名潜心书斋的青年学子，成长为心怀家国、以笔报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全境沦陷，山河破碎、百姓受难。国土沦丧的危局打破了杨朔闭门治学的个人理想。他清醒意识到，乱世中中国人不能独善其身，主动接触进步力量，结识了中共地下党人金伯阳、林郎等革命志士。

在进步人士的引导下，杨朔系统学习革命理论，阅读党的秘密文件，认清民族救亡的迫切使命，主动参与地下进步活动，彻底跳出一个关怀的小格局，将文学理想与民族救亡大业紧紧相融。

此后，他积极融入东北左翼文艺阵营，与萧军、萧红、白朗、罗峰、罗荪等进步作家并肩前行，直面黑暗现实、书写时代悲愤。他的文风彻底转型，不再局限于山水闲情，转而聚焦民生疾苦、抗日救亡，笔墨间满是斗争锐气与家国大义。

鲜明的进步立场与激进的抗日创作，引来日伪当局的敌视与忌憚。1936年冬，日伪宪兵放出狠话，他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。

在太古洋行的协助下，杨朔紧急调离哈尔滨，南下上海避险。临行之际，外籍雇主感念其品行才学，特地赠予路费资助；恩师李仲都设宴饯行，提笔赋诗惜别，未句盛赞“蓬莱山明水秀地，如此才有几人”，道尽对爱徒的认可与期许。

1936年冬，杨朔正式告别生活了11年的哈尔滨。冰城十一载，是杨朔夯实文学功底、锤炼心性品格的11年，更是冲破书斋局限、完成思想觉醒、确立革命人生方向的11年。从蓬莱书斋少年到北国进步青年，从单纯文人到革命文艺战士，这段曲折厚重的青少年成长历程，沉淀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。自此，他告别寒窗岁月，奔赴时代前沿，踏上以文立心、以笔报国的革命文艺道路，开启人生崭新篇章。